

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援助動機的探討——

黃自進

一、前言

二、辛亥革命前

三、辛亥革命

四、辛亥革命後

五、結論

一、前言

犬養毅^①是歷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元老政治家，以熱心援助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而著名於世。在孫中山以日本作為革命活動的基地時期，犬養毅除給予經濟援助以外，也是組合日本各種民間團體給予有力援助的靈魂人物。同時他也擔荷了孫中山與日本政界、財界接觸的橋樑。對孫中山推動革命運動而言，他的支援是一不可或缺的助力，因此他們的友誼，時至今日，仍是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者們津津樂道的課題。但過去的研究過份強調在二次革命以前兩者的合作關係，却忽視了

① 犬養毅生於1855年，是日本本州岡山縣人，幼年時最大志向是希望能成爲一漢學教師，故自幼就熟讀經書，對中國歷史、文物典章均有相當造詣。1876年，進入慶應義塾大學就讀，奠定了他往後在日本政界發展的基礎。1881年時因慶應義塾大學創辦人福澤諭吉的推薦，任統計院總裁大隈重信的幕僚，爾後即以大隈重信的左右手身分，活躍日本政壇。1890年當選第一屆眾議院議員，爾後連任十七屆。1898年大隈重信第一次組閣時會出任文部大臣，1910年首創立憲國民黨，自立門戶，活躍於日本兩大政黨之間，代表第三勢力。由於他與孫中山以及立憲派的康有爲、梁啟超都有深厚的友誼，被公認爲日本政界的中國通，在日本的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1922年另創革新俱樂部，仍不改初衷以第三勢力自居，要求憲政革新及提早廢除選舉資格之限制。1925年，因準備退休，故解除自身所領導的政黨，而舉黨加入政友會。1929年却因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驟逝，黨內派閥林立，派閥領袖相持不下，得以政友會元老的身分被推爲總裁。九一八事變後復以政友會總裁身分出掌內閣，擔任日本第二十九任總理。翌年5月15日因反對偽滿洲國的成立並且計劃整頓軍紀，被少壯派軍人暗殺於總理官邸，享年七十八歲。

爾後他們之間關係的變化。^②本文以犬養毅援助孫中山的動機作為焦點，並以各時期援助動機的變遷，來闡明他們之間關係的演變過程及其原因。此外，為了便利起見，孫中山在各時期所推動革命運動的活動組織，本文一律以「革命黨」一詞代替。

二、辛亥革命前

犬養毅與孫中山的交往始於孫的第二次到達日本。^③光緒二十三年（1897）八月，孫中山從加拿大到法屬安南的途中，路經橫濱時，與宮崎滔天會面。在那次會見中，宮崎滔天力勸孫中山留在日本，以日本作為革命黨的活動基地。孫中山接受宮崎滔天的建議，並經由其介紹，與犬養毅會面。關於此次會面，犬養毅作了以下的回憶：

「當時宮崎滔天以外務省諮議身份負責調查中國南方秘密會黨。但他到中國後始知會黨領袖孫文在從歐美東來，會途經日本，故其趕回橫濱，俾與孫文見面。交談之下，對孫文人品大為折服，故力勸他留在日本發展革命事業，並將孫文帶到東京。但外務省次長小村壽太郎積極反對孫文留在日本。在這種進退兩難之際，本人基於人道立場而參與援助孫文的活動。」^④

② 犬養毅曾熱心支助孫中山革命運動的史實，是所有犬養毅或者孫中山的傳記裏必定論及的課題。此外，還有不少以研究兩者關係為主的著作介紹這段歷史。但這些過去的研究大部份都過份強調兩者的友好合作關係，却鮮少探討二次革命後他們之間的關係因思想及基本立場的差異而發生的變化。例如，犬養毅的傳記方面有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中卷（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39年），頁715-725，735-741頁；犬養毅傳刊行會編，*犬養毅傳*（東京，犬養毅傳刊行會，1932年），頁80-85；鶴崎熊吉，*犬養毅傳*（東京，誠文堂，1932年），頁465-471；內海信之，*憲政的巨人犬養毅氏*（東京，農政會出版，1930年），頁95-96；岩淵辰雄，*犬養毅*（東京，時事通信社，1958年），頁111-118；吉岡達夫，*犬養毅：血の日曜日*（東京，人物往來社，1968年），頁213-224等著作。孫中山的傳記方面有吳相湘編撰，*孫逸仙先生傳*，上下卷（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71年），頁226，1176-1177；胡去非編，*孫中山先生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8年），頁32-33。陳健夫，*國父全傳*（臺北，大西洋圖書公司，民國59年），頁80，273。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國父孫中山先生傳*（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民國54年），頁66，329等著作。以研究兩者關係為主的著作尚有兒野道子，*「孫文を繞る日本人：犬養毅の對中國認識」*，平野健一郎編，*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頁130-149；宋越倫，*總理在日本之革命活動*（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2年），頁2，26-29；陳固亭，*國父與日本友人*（臺北，幼獅書店，民國54年），頁9-14；彭澤周，*「犬養毅與中山先生」*，*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67年），頁307-332；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65-68, 145-148, 163-166等專論。

③ 孫中山第一次逗留日本，是光緒21年（1895）11月從香港赴檀香山途中，路經日本之時。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上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頁84-85。

④ 當時的橫濱為自由港，外國人可自由進出，但離開橫濱進入日本內地則需簽證。犬養毅，*「世界人の横顔（九）：ボロ洋服の孫文にも革命志士の風骨」*，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30年7月21日。

照犬養毅的說法，可知宮崎滔天將孫中山從橫濱接到東京及勸說孫中山留在日本之事，完全是出於宮崎滔天的個人意見。而當事人宮崎在其回憶錄中，也證明犬養毅所言不虛，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⑤但根據「孫文學說」所言，却認為宮崎的所作所為是受到犬養毅的指示。^⑥兩者的說法顯然不同，但是如將犬養與宮崎之間的關係加以探討，就可以瞭解兩種說法所以發生差異的原因。因為宮崎應日本外務省聘為諮議前往中國調查秘密會黨，是出於犬養之斡旋，^⑦而宮崎力勸孫中山留在日本，是使用犬養名義而為之。^⑧由此推斷，犬養之所以援助孫中山絕不像他自己所說純粹基於人道立場，而是早有意圖。^⑨這點，從犬養與當時內閣的密切關係，更可以得到佐證。

彼時，中日戰爭雖已結束，但是主政的松隈內閣^⑩仍然認為中國是東亞第一大國。如何防止中國的報復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課題。派遣宮崎滔天到中國南方調查秘密會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利用反清秘密會黨的力量來牽制滿清政府的反日政策，^⑪而負責執行政策的就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心腹犬養毅，^⑫可見犬養毅對孫中山伸出援手，無非是執行日本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利用革命黨人而已。

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月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誕生。內閣的更替也導致日本政府對中國外交政策有所變化。山縣內閣為改善與滿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雖然放棄公開支持革命黨的政策，^⑬但其企圖利用革命黨來牽制滿清政府的作法仍然不變，只

⑤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收入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東京，平凡社，1971年），頁107-120。

⑥ 孫文學說的記載如下：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宮崎滔天）、平山周二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62年），頁494。

⑦ 同註⑤，頁108。

⑧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76-178。

⑨ 宮崎滔天在接受外務省調查中國秘密會黨的任務後，一度曾猶疑是否應立即啟程，為此，犬養毅在致宮崎滔天的書信中，要求他立即啟程，早日投入革命黨陣營。由此函件中也可得知犬養毅在未遇見孫中山之前，就對革命黨非常有興趣。「宮崎滔天宛犬養毅書翰」（1897年6月21日），宮崎滔天全集，第五卷，頁665。

⑩ 松隈內閣是總理大臣松方正義及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兩派勢力所組織成的「聯合內閣」。從1896年9月至1898年1月止出掌日本政局。

⑪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12-20。

⑫ 油谷恭一，「東亞同文會と霞山公：創立當時の記録より」，支那，1934年2月，頁114-115。犬養毅，「搖籃時代のわが對支方針」，犬養木堂傳，中卷，頁715。

⑬ 山縣有朋內閣誕生後，就斷絕日本官方與革命黨人的交往。

是執行此政策的機構改由外務省的外圍組織東亞同文會負責。^⑭孫中山則透過犬養毅，^⑮從東亞同文會接受援助。孫中山旅日期間，犬養毅除負起照顧孫中山全盤生活的責任外，^⑯也負責替革命黨籌措經費。^⑰雖然孫與犬養毅交往頻繁，但犬養對孫中山以實現中國民主化爲己任的理想並不重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也沒有留下好的印象。他認爲革命黨徒都是一羣「秘密會黨的好事之徒」，^⑱從這評語中也可看出他對革命黨人並未抱有太大的期待。犬養的這種態度，可由其在庚子義和團之亂時所作的各種應變得到證實。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之亂，針對中國的變局，東亞同文會於六月二十三日召開評議會並通過以下決議：

北京政府如喪失統治機能或者遭致滅亡時，日本政府爲求早日恢復中國和平，應率先幫助中國在南方建立新政府，但列國如搶先實施瓜分政策，日本政府也應當機立斷，選擇適當地區加以佔領。^⑲

此決議案可看出，東亞同文會的主要政策是想趁中國北方混亂之際，在南方拓展其勢力範圍。此政策除得到日本政府默許外，^⑳也和犬養毅的想法不謀而合。六月二十八日，犬養致友人小橋藻三衛的書信中，提到他對拳亂之下中國局勢的看法。

第一、在列強利益互相衝突及相互牽制下，中國應可避免被瓜分的厄運。

第二、北方的混亂如繼續下去，則革命黨及立憲派都有揭竿而起的可能。不過這些起義活動都不足以影響大局，反而有助於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總督趁勢而起。換言之，革命黨及立憲派的起義活動，能增加南方總督藉平亂擴展勢力，進而伺機成立獨立政權的機會。

第三、爲了順利取得列強承認，新政權仍應尊奉滿清皇室，但不妨另立新帝。^㉑

^⑭ 日本政府用「支那調查費」的名義，撥款給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會則利用此經費援助革命黨。「福岡縣知事深野一三發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宛の報告書」(1900年8月26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第一卷，外交史料館藏，高秘第848號，原件。又參閱「福岡縣知事深野一三發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宛の報告書」(1900年8月28日)，同上，高秘第857號，原件。以上資料是尚未出版的史料，簡稱「外務省記錄·革命黨關係」。

^⑮ 犬養毅時任東亞同文會評議員。犬養木堂傳，中卷，頁718-719。

^⑯ 孫中山在東京的生活費，是經由犬養毅斡旋，由九州財閥平岡浩太郎提供。古島一雄，「革命中國との因縁：一老政治家の回想(六)」，中央公論，1951年2月，頁190-191。

^⑰ 根據福岡縣知事深野一三的報告，東亞同文會前後共資助革命黨人四萬日幣，同註⑭。

^⑱ 同註④。

^⑲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磨日記，第三卷(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年)，頁190。近衛篤磨時任東亞同文會會長。

^⑳ 同上，頁201。

^㉑ 「小橋藻三衛宛犬養毅書翰」(1900年6月28日)，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書簡集(東京，人文

而在東亞同文會所召開的對中國政策研究會上，犬養也力陳日本政府對華政策應把主力放在南方，建立隨時能支援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體制。軍部在華北的所有活動，應僅限於配合列強的共同出兵政策，而不必寄以厚望。^②

從以上犬養的論點可以看出，此期間他首要的目標，乃在於策動那些提倡東南自保運動的南方督撫，趁南北分立之際，在中國南方成立一個親日本政權。^③此時，孫中山亦正策劃在廣東發動起義，他希望趁北方混亂之際，能在南方建立共和政府的根據地，爾後伺機統一中國。從犬養毅策劃的方案來看，犬養對孫中山的實力並不肯定，認為廣東起義即使成功，孫中山也無法掌握大局，但基於起義活動，將有助於南方總督爭取獨立機會之理由，他也未曾放棄與孫中山繼續保持友好關係，^④尤其當東亞同文會為了加強維繫與南方督撫的友誼，斷絕對孫的援助時，^⑤犬養仍然擔負着照顧孫中山的責任，繼續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然而，經義和團之亂，日本政府認清清朝政府脆弱的本質，於是對中國政策開始有明顯的改變。其新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如何利用滿清政府的腐敗而積極擴展日本在中國的權益。當日本政府認為滿清只是一個外強中乾的政府時，孫中山自然而然也被視為喪失利用價值的政治人物。

在日本政府對中國外交政策有巨大轉變之際，犬養毅仍不改其援助孫中山的態度，個中理由，可從他的國際政治觀加以探索。他認為中國局勢動亂的根源在於滿清政府太過脆弱。正因中國無法保護自己的現狀，導致西洋列強爭先恐後在中國擴展勢力範圍，使中國淪為列強爭權奪利的戰場，不僅使中國政治動亂，也使亞洲無安寧之日。因此，他主張日本應協助中國的改革運動，建立一個能和西方列強對抗又能和日本親善的安定政府。^⑥基於此一信念，他不僅繼續援助孫中山，也成為孫

閣，1940年），頁50-51。編者將此信函編為1899年所寫，但考察其信函內容，所述者完全為1900年義和團動亂下的中國政壇變局，故將發函日期更改為1900年。

② 「犬養毅ノ渡清」（1900年7月20日），外務省記錄・革命黨關係，第一卷，乙秘第383號，原件。

③ 為此，他也曾計劃7月中旬到中國活動。同上。

④ 孫中山為了廣東起義，而於6月8日啓程前往香港時，犬養毅於六月六日親自設宴餞別，並命內田良平隨行，以便全力支持孫中山。內田良平為支援孫的起義活動，曾在福岡、廣島等地招募了三百餘自願軍。「警視總監大浦兼武發青木外務大臣宛の報告書」（1900年6月7日），同上，甲秘第52號，原件。「長崎縣知事服部一三發外務大臣子爵青木周藏宛の報告書」（1900年7月19日），同上，高秘第251號，原件。又參閱初瀨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的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年），頁59。

⑤ 同註③，頁195。

⑥ 犬養毅「純民黨に對する名士の意見」，日本及日本人，1910年4月1日，頁91。

中山最重要的支柱。²⁷惟儘管如此他仍然不相信孫中山的理念，也不認為唯有民主共和政治才能救中國。此點，可在辛亥革命時期，他們就中國應實行何種政體有過激烈的爭執外，從此時期犬養毅的言行中也可以證實他們之間的理念並不一致。因為犬養毅在其大力援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之餘，也不忘支持立憲派在日本的發展。²⁸雖然他這種腳踏兩條船的作法，曾被革命黨人張繼當眾責問過，但他仍然我行我素。他辯稱，中國首重者在於早日改革，改革後的政體無論是君主立憲或者是民主共和，皆是他所樂見。²⁹足見中國應採行何種政體，並非他最關心的課題，他最重視的是如何在中國建立一個能與西方列強對抗的親日本政權。

三、辛亥革命

民國前一年(1911)十月，武昌起義成功。同年十一月十日，犬養毅致友人古島一雄的書信中，談到他對中國局勢的看法。他指出，內戰若持續下去，難保列強不會出面干涉，如列強出面干涉，則中國將有被瓜分的危機。為避免列強藉口干涉，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士應在立憲君主的體制下與非袁世凱一派的官僚合作。他推測十月二十七日資政院所通過的：取消親貴內閣；憲法須由人民代表協贊；赦免國事犯；立即開國會等建議案，將會得到前兩廣總督岑春煊、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江南提督張勳等非袁世凱派系的人士支持。因此，除非革命黨人妥協，否則內戰難免。他希望古島一雄與宮崎滔天研究，如何使革命黨人「捨名求實」，在實際能掌握政權下與滿清政府妥協。³⁰

在致另一友人豐川良平的書信中，他表示袁世凱勢必遭受被暗殺的命運，爾後北京將陷入混亂，為日本之計，必先防止宣統流亡俄國，如能誘使宣統東來日本則更佳，表示他本人也正在策劃此事。³¹

²⁷ 惠州之役後，孫中山就一直為生活所困。雖然此刻法屬安南總督屢邀孫到安南一遊，但皆因無法籌措旅費，而困居橫濱。此事為犬養毅所知，提供一千日幣讓孫中山順利成行。為此，孫中山致犬養毅函（1902年10月18日）中，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弟於先生見之矣」之語，答謝犬養毅。參見梅溪昇，「孫文に關する數點の犬養毅陸實宛書翰について」，日華月報，1975年3月，頁2-4；及參閱國父年譜，上册，頁169。

²⁸ 犬養毅對立憲派的支助，可歸納如下：(一)擔任立憲派在日本橫濱所經營的大同學校名譽校長；(二)提供梁啟超生活費；(三)支持「政聞社」的成立。詳情請參閱拙文，「犬養毅と中國：北清事變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第26號（1987年），頁50-55。

²⁹ 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民報，第17號，光緒33年(1907)10月，頁1。

³⁰ 「古島一雄宛犬養毅書翰」（1911年11月10日），犬養木堂書簡集，頁148-149。編者將此書函編為民國2年(1913)所寫，但考察信函內容，所述者為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局勢，故將發函日期改為民國前1年(1911)。

³¹ 「豐川良平宛犬養毅書翰」（1911年11月26日），同上，頁115-116。

從以上兩封私函中，犬養毅對武昌起義後中國局勢的見解可歸納出以下各點：第一、對西方列強的對華外交政策持不信任態度。他認為中國如持續內戰，則必定會遭受瓜分危機，革命黨人應提早與滿清政府妥協。第二、有強烈的反袁世凱傾向。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化軍隊『新軍』的創辦者，深得歐美列強的信賴。在犬養毅謀求革命黨人與非袁世凱派系官僚合作的構想裏，所以堅持排斥袁世凱，就是因為袁有歐美支持之故。換言之，犬養毅深恐西方列強，尤其是與袁世凱有深厚淵源的英國，會趁辛亥革命之際，支持袁主政以達到排除日本在中國勢力的目的。^⑳第三、不認定革命黨人有掌握大局的能力。他認為欲避免內戰的持續，革命黨人應在君主立憲的基礎下早日與非袁世凱派官僚妥協，此一主張說明犬養毅並不肯定革命黨的實力。在他倡導革命黨應「捨名求實」時，在在顯示協助孫中山實現民主共和國理想之事，並非他援助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

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他認為即刻返國，不如遊說各國，爭取列強友誼，更有助於革命發展。^㉑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在巴黎給『民立報』的電文中表示，「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㉒從這則電文可以看出，面對武昌起義成功後的新中國局勢，孫中山最關心的還是如何早日鞏固革命陣營，以便順利推展民主共和政治。對於推舉何人當大總統及「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的決議案，孫中山皆不予置評。他只強調早日鞏固國基的態度，在在說明早日實行民主政治為孫中山的首要目標，革命黨人是否能掌握政權反而成為次要考慮。此點與犬養毅為達到排斥袁世凱的目的，不惜要求革命黨人在立憲君主體制下與清朝妥協的作法互不相容。

民元前一年(1911)十二月十七日，犬養毅起程到上海。根據他的回憶錄記載，此行主要是企求在君主立憲體制下，想說服追求共和政治的孫中山、黃興與倡導立憲體制的康有為、梁啟超、岑春煊等共同攜手合作。^㉓為了達到此行目的，在臨行前犬養毅拜訪了當時也流亡日本的康有為，勸其一掃過去與革命黨的恩怨，不妨與

⑳ 1912年2月，犬養毅為阻止南北和議，啟程趕往中國之前夕，致友人信函中，透露出他反袁世凱的心態。他認為袁世凱的出掌中國政局，不僅意味著英美勢力在中國的坐大，也象徵日本對華政策的挫敗。「三浦觀樹宛犬養毅書翰」（1912年2月14日），山本四郎編，三浦梧樓關係文書（東京，明治史料研究連絡會，1960年），頁105。

㉑ 同註⑥，頁504-505。

㉒ 同註⑥，第三冊，頁163。

㉓ 犬養毅，「支那との關係」，犬養木堂傳，下卷，頁70。

革命黨携手合作，共同推展中國的改革運動。^⑳犬養毅到中國後，立即散發康有為的新著『救亡論』，^㉑大力推薦康的「虛君共和制」理想。犬養毅如此熱心調解孫中山與康有為的關係，無非是希望他們能結盟對抗袁世凱。此時犬養毅已放棄革命黨與官僚合作來達到排斥袁世凱的計畫。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凱出任總理大臣，十二月二日張勳的部隊被革命黨軍擊潰，這些情勢的變化，促使犬養毅不得不放棄利用既存官僚力量來制衡袁。袁世凱內閣的出現，意味着清朝的整個大權已為袁所掌握，而張勳的敗北則象徵着非袁派勢力的沒落。因為在既存官僚系統中，已無制衡袁的力量存在，加以僅憑革命黨人勢力，亦無法和袁世凱抗衡，所以犬養毅只有向在資政院與各省諮議局裏擁有龐大勢力的立憲派鼓吹與革命黨結盟，企圖以這股力量抗衡袁世凱。^㉒犬養毅這種以打倒袁世凱為首要目標的做法，基本上是與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時期犬養毅與日本政府在策略的應用上雖然有所迥異，但目標却是相同的。^㉓

犬養毅抵達上海六天後，孫中山也到達上海，在遊說歐美各國，取得列強不干涉中國革命保證後的孫中山，對革命前途持更樂觀的態度。他對袁世凱雖不信任，但却認為可利用袁作為推翻滿清政府的利器。^㉔換言之，他以推翻滿清為第一考慮目標，為達到此目的，他寧願與反正的袁世凱妥協，也不願與堅持維護君主制的康有為合作。此自與犬養毅力謀排斥袁世凱，希望能與康有為合作的企求，截然不同。

然而犬養毅在抵華後也逐漸發現他原來的計畫，和中國現狀有脫節之處。犬養毅抵達中國的前一日（十二月十八日），南北雙方已於上海召開會議。南方願意和談，無非是企求透過和談達到逼退宣統的目的，為此，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甚而公開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大總統。^㉕從此一決議中也可得知利用擁護袁出任大總統作為餌，來誘使袁逼宣統退位已成為革命陣營的共識。尤其是原屬於立憲派

^⑳ 無名氏，「支那事變と三政黨」，太陽，1912年3月，頁117。

^㉑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1年12月27日。

^㉒ 犬養毅於1912年1月15日從上海啓程回日本，向大阪朝日新聞記者透露他對中國局勢判斷的錯誤。他表示：「原以為康有為、梁啟超在資政院及諮議局方面非常具有影響力。但至今才明白他們在中國政壇上已漸漸失去影響力。」此刻的言論，如與他赴華前，撰文所稱以康有為為首的立憲派與革命黨為中國兩大改革勢力的論點加以比較，在赴華之前，他似乎高估了康的影響力。犬養毅，「木堂談片」，大阪朝日新聞，大阪，1912年1月18日。及參閱犬養毅，「何の道革命は免れざる運命」，日曜畫報，東京，臨時增刊：支那革命畫報50號，頁33。

^㉓ 詳情請參閱拙文，「犬養毅と中國：辛亥革命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第25號（1986年），頁65-69。

^㉔ 同註③，頁438。

^㉕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3年），頁319。

的地方名流，在民族意識高漲下，已無法忍受滿清皇室的存在，他們反而對袁世凱寄以厚望，認為唯有袁世凱才能使革命後的中國安定。^④原對康有為心存幻想的犬養毅，在其抵華後也已意識到康有為已無法完全控制立憲派，^⑤於是，他又放棄利用孫康結盟以制衡袁的作法，進而考慮利用前兩廣總督岑春煊與孫中山的結盟以抗衡袁世凱。他的老友熊希齡就以此時期犬養毅的活動作如下的描述：

「前南北議和時，犬養毅等於前年（1911年）冬來華運動南北分立。渠與希齡本屬舊交，屢至滬寓告知希齡，謂袁如得志，中國可危，不如勸孫黃公推岑為總統與袁對抗，並要求希齡介紹往見。希齡與張謇、湯壽潛、莊思緘、趙鳳昌諸君與犬接談數次，竭力反對。幸黃興當時力主和議，岑亦病辭不見，犬乃回國。去年（1912年）春間再到上海，乃不與希齡接洽矣。此日本民黨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實在情形也。」^⑥

從熊希齡的描繪中，可知犬養毅在抵華後不久，已將其活動方針改為以協助岑春煊任總統為餌來誘使他與革命黨人合作。因為犬養毅始終認為，僅憑革命黨勢力，必無法與袁世凱抗衡，所以想出以總統職位來換取合作，在這個計畫中，他主張不妨用虛位元首之職位讓給岑春煊，而實權則由革命黨來控制。當時日本輿論界流傳一句「北袁南岑」的話，認為在中國的官場上，北方首推袁世凱，南方則以岑春煊為代表性人物。犬養毅也承襲此說，認為如能擁戴岑春煊擔任臨時政府元首，必可動員在南方的前清政府大員及立憲派的要員加入反袁的陣營。^⑦此事可從其遊說對象集中在熊希齡、湯壽潛等前官僚及立憲派要角張謇等人身上得到旁證。

民國元年(1912)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正式宣告中華民國誕生。就職當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宣稱就任大總統只是過渡之舉，待滿清推翻，必定讓賢。^⑧從這電報可知，透過和談以求南北統一是孫中山的理想。但是犬養毅與孫中山在南北和議上却有相當大的歧見。孫中山為求國土早日統一，願在民國的體制下與袁世凱達成妥協，而犬養毅則不惜犧牲中國統一的機會，只求打擊袁

^④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民國58年），頁219-220。

^⑤ 同註^④。

^⑥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頁178。在民國前一年(1911)6月，犬養毅曾在日本為文公開推舉熊希齡為滿清政府年輕一代官僚的佼佼者，從此事可看出，辛亥革命以前，犬養毅老早就知曉熊希齡，故熊自稱為犬養毅老友並非言過其實。犬養毅，「帝國近時の外交評論」，太陽，1911年6月，頁138。

^⑦ 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東京，原書房，1966年），頁468。又參閱頭山滿，「孫文·蔣介石·汪精衛」，改造，（1940年5月），頁360。

^⑧ 同註^⑥，頁335-336。

世凱。由於犬養毅的想法，不為革命黨人所接受，致推舉岑春煊為總統的活動，也就無疾而終了。

如前面所述，只要袁世凱願意支持共和立憲政體，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就願意推舉袁為民國總統。雖然南方政要一再向袁示意，但袁的態度却一直很曖昧，他雖有意出任總統一職，却不願接受臨時政府的束縛。正如李劍農所言，袁世凱與革命黨人在根本精神上就有差異，革命黨人方面雖然早已默許袁氏為將來共和政府的總統，但共和政府的基礎是建立在民權之上，袁氏却希望除了取得總統地位以外，還要獨攬共和政府的一切大權。因此革命黨人所希望和議的結果是由宣統將一切大權交還國民，而袁氏所希望的却是大權獨攬於一身。⁴⁷由於雙方在基本認知上大有差距，不難想像和談過程是一波三折的。

南北和議遲遲未決，南京臨時政府開始面臨財政危機。為龐大軍需費用而感到困擾的臨時政府，由於無法從光復各省徵稅，在沒有固定的財源狀況下，只得依賴對外借款一途。犬養毅為確保臨時政府的安定，曾熱心參與臨時政府與日本財閥之間有關漢冶萍公司及招商局借款的談判。⁴⁸此外，他也利用輿論及他自己所屬的立憲國民黨大會，呼籲日本政府應率先列強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在議會裏，⁴⁹犬養毅則大力抨擊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不當，力促日本政府反省。⁵⁰他還組織「承認民國政府同志會」，號召日本各民間團體向政府施加壓力，促其早日承認中華民國。⁵¹犬養毅在日本為南京臨時政府所作的各種努力，除一一為當時革命黨人所創辦的「民立報」詳盡報導外，他的義舉也被大力讚賞。⁵²從「民立報」推崇他的報導，可見革命黨人對他是寄以厚望。孫中山本人對此時期犬養毅的活動持何種評價，由於資料不足，無法斷言；但從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後，立即發佈公告，聘請犬養毅擔任政治顧問一事來看，⁵³孫對犬養毅也是期待有加。犬養毅雖婉拒應聘政治顧問之職，⁵⁴但如前所述，其返國後仍不斷為臨時政府奔走，並不因彼此對中國局勢的見解不同而有所改變。

⁴⁷ 同上，頁329。

⁴⁸ 同註⁴⁹，頁71。又參閱中野泰雄，父：中野正剛傳（東京，新光閣書店，1958年），頁195。

⁴⁹ 犬養毅，「支那當面の政局」，東京日日新聞，東京，1912年1月19日；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2年1月22日。

⁵⁰ 東京日日新聞，東京，1912年1月27日。

⁵¹ 野澤豐，「辛亥革命と大正政變」，由井正臣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有精堂，1977年），頁57。

⁵² 民立報，上海，民國元年2月2日、2月4日、2月5日。

⁵³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三號。

⁵⁴ 同註¹⁶，頁195。

民國元年(1912)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南北達成和議，犬養毅得知後，立即於二月十六日再度啓程前來中國。在他與孫中山的會談中，^⑤力陳臨時政府與袁世凱妥協的不當，並主張廢除南北和議的決議。當時孫中山也因南北和議一再拖延，已對袁世凱漸感不滿，並與袁漸成對立。^⑥但是對面臨財政破產危機的南京臨時政府而言，與袁氏妥協，無疑是唯一的選擇。在犬養毅無法替臨時政府拓展財源的情況下，孫中山即使同意犬養毅的說法，也無法改變與袁世凱妥協的形勢。^⑦惟由於孫中山對袁的不信任，此時期犬養毅的反袁活動，反而能得到孫中山的共鳴。舉例言之，南北和議後，雙方首要議題為新政府首都應設何處。犬養毅認為定都南京有利於革命黨人監視袁世凱。^⑧但當犬養毅大力提倡定都南京之時，却遭章炳麟所主辦的「大共和日報」攻擊，認為他所以反對定都北京無非是怕中國主力留在北方，阻礙日本併吞滿蒙的計畫。^⑨當犬養毅受「大共和日報」圍剿時，「民立報」却挺身而出為其辯護，認為犬養毅是歷年來日本政界中少有主張中日親善的政治家，和主張侵略中國的日本政府不能相提並論。^⑩「民立報」肯為犬養毅辯解，最大理由在於他反對定都北京的看法和孫中山一致。^⑪

四、辛亥革命後

民國二年(1913)二月，孫中山以籌辦全國鐵路全權名義，訪問日本。^⑫犬養毅除到東京車站親自迎接外，^⑬也在紅葉會館設宴款待。^⑭顯示他們並沒有因辛亥革

^⑤ 犬養毅於2月26日與孫中山會談，民立報，民國元年2月26日。

^⑥ 民國元年(1912)2月3日，孫中山與三井物產公司駐上海辦事員森格會談時，曾表示如在2月17日(舊曆年年關)以前，能得到日本的援助，則將停止南北和議揮軍北上。藤井昇三，「孫文と『滿州』問題」，關東學院大學文學部，第52號(1987年度紀要)，頁44-46。

^⑦ 犬養毅認為促成南北達成和議最重要原因是南京臨時政府無法解決財政危機。犬養毅，「中華民國的過去及將來」，太陽，1912年12月，頁111-112。胡漢民的回憶錄也指出，孫中山始終不願妥協而南京臨時政府遷就南北和議，主要癥結是無法解決財政危機，軍隊方面也有因欠餉而有譁潰之慮。胡漢民，胡漢民自傳，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三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2年)，頁432-433。

^⑧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頁460-461。

^⑨ 原文已無可查，此是轉譯於「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裏的日文資料。同上，頁460。

^⑩ 空海，「我之犬養毅觀」，民立報，上海，民國元年3月10日。

^⑪ 在民立報於3月10日為犬養毅辯護之前八日，民立報却也刊登力責犬養毅的論評。文中指出中國南北正盡棄前嫌力謀統一之際，犬養毅在中國所為是種挑釁舉動。少白，「犬養毅」，民立報，上海，1912年3月2日。短時間內，民立報刊登出對犬養毅評價如此迥然不同的論評，顯示出民立報內部對犬養毅看法並不一致。從革命黨陣營裏以孫中山這一派最熱心定都南京，及辛亥革命後僅餘此派繼續與犬養毅來往的現象來看，替犬養毅辯護的這一股勢力，應可推定為是孫中山這一派。

^⑫ 同註③，頁542-543。

^⑬ 時事新報，東京，1913年2月15日。

^⑭ 吳相湘編撰，孫逸仙先生傳，下冊(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71年)，頁1177。

命時期彼此想法的差異而影響所建立的友誼，犬養毅仍以孫中山的支援者自居。至於對袁世凱，犬養毅仍然維持既有的反對態度，也不願接受南北妥協的事實。^⑥因此當南北關係因宋教仁被刺事件而呈現緊張時，犬養毅則頻頻在日本發動支援革命黨人活動，他以支持革命黨人的立場，嚴厲譴責日本外務省盲從列強的對華政策，支援袁世凱，放棄自我主張作法的不當。^⑦為達到援助革命黨人的目的，他也企圖阻止日本政府借款給袁世凱，^⑧同時他也接受孫中山、黃興的託付，^⑨親自拜訪山本權兵衛首相，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擬定對華政策。^⑩這些活動都顯示出在二次革命以前，犬養毅仍以支援革命黨人自居，代表日本政壇中一股親革命黨人的勢力。而孫中山也仍把犬養毅視為友人，期待經由他的支援，能改變日本政府親袁世凱的作法。

然而，二次革命的忽起忽落，暴露出革命黨脆弱的本質。驚訝於革命黨人實力薄弱的同時，犬養毅對袁世凱掌握大局的實力又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基於這種瞭解，他放棄在中國建立親日政權的想法，轉向鼓吹日本應在中國積極擴充地盤，^⑪認為唯有日本確保膠州灣，^⑫及在中國建立一較西方列強更優越的政治地位，^⑬才可以與列強對抗。所以他雖然反對日本持高壓手段和中國談判二十一條條約，却同意日本政府所提出的要求，也認為二十一條條約可一舉解決中日兩國多年懸而未決的爭議，^⑭由於他對中國政局已不抱任何期待，所以他開始修正既有的反袁態度，

⑥ 犬養毅，「支那統一事業之二問題」，東西時報，1912年5月，頁7-8。

⑦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3年5月27日、6月4日。

⑧ 犬養毅為阻止日本政府交付借款給袁世凱，與尾崎行雄、頭山滿、中野武營等人召開「反對政府對華外交」協議會，呼籲日本政府在中國內爭期間嚴守中立，延緩交付借款給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政府。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3年6月6日。

⑨ 「古島一雄宛犬養毅書翰」（1913年6月2日），犬養木堂書簡集，頁148。在此信函中，犬養毅提到孫中山及黃興懇託他去遊說山本權兵衛首相，以謀日本更改對華外交政策。

⑩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3年6月4日。

⑪ 在二次革命失敗前，犬養毅最關心的課題是如何在中國建立一個安定的親日政權，並非熱衷於在中國謀求政治及軍事上的特權。例如，日俄戰爭後，他曾提倡放棄旅順軍港以換取日本在揚子江流域發展商業的權利。在辛亥革命期他參與日本財閥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借款談判時，也力主借款的目的是幫助南京臨時政府安渡財政危機，而非趁機擴展勢力範圍。為此，他在借款交涉失敗後，在日本公開為文，宣稱日本財閥所開的借款條件是趁火打劫的強盜行爲。詳情請參閱拙文，「犬養毅の中國における日本の權益論：明治、大正期」，中村勝範編，近代日本政治の諸相（東京，慶應通信出版社，1989年），頁470-474。

⑫ 犬養毅認為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必將遭受到美國的挑戰。鑑於美日兩國經濟實力的懸殊，日本為求補救之道，唯有控制軍事要塞，才能在戰略上取得平衡。因此，他堅稱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能否擁有膠州灣，關乎日本的安危。犬養毅，「國家發展の大方針」，青年，1915年11月，頁36-37。犬養毅，「後繼內閣如何」，青年，1916年4月，頁15-16。及參閱犬養毅，「總選舉に際して政局と國務の要點を明示す」，第三帝國，1917年4月10日，頁14。

⑬ 犬養毅，「日支の親善を如何せん」，青年，1915年6月，頁6。

⑭ 同上，頁3-7。又參閱犬養毅，「外交失敗と内閣の責任」，青年，1915年7月，頁3-14。

相對的對孫中山就逐漸疏遠。犬養毅態度的改變，反映在他與孫中山的交往狀況及他對洪憲帝制的看法。民國二年(1913)八月，犬養毅雖然在頭山滿的懇請及多年友誼的情面上，說服日本政府庇護孫中山。^⑭但此後對孫中山就表現了疏遠的態度，例如從民國二年八月至五年四月，孫中山旅日期間，兩者雖同處東京，但相見次數不過九次，而民國四年更是整年沒有會晤紀錄。^⑮此外，孫中山在這段期間，籌組中華革命黨，亟謀東山再起，犬養毅對革命黨人的活動一律採觀望態度。又如民國三年八月，孫中山想乘第一次世界大戰軍興，列強無暇顧及袁世凱之際，再次發動革命，正式懇求犬養毅代為籌措經費，他却始終藉故拖延，讓事情不了了之。^⑯他對孫中山往日的熱忱，已逐漸淡漠，也對革命黨人的活動劃清界線，他這種態度，在洪憲帝制問題上更為顯著。

民國四年(1915)袁世凱準備稱帝，而日本政府却於同年十一、十二月間，兩度聯合英、俄等國勸告袁氏延緩變更國體的計畫，並在十二月底護國軍軍興後，公然支持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所有反袁力量，企圖趁機推翻袁世凱。^⑰對日本政府這種公開反對袁世凱稱帝的作法，犬養毅頗不以爲然，他撰文表示，中國無論是實施帝制或是共和，領導者不論是袁世凱或孫中山，對日本而言都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是否對日本採取親善政策。^⑱言下之意，他不但反對日本政府的反袁政策，同時也公開與孫中山劃清界線。自清末民初以來，犬養毅在日本大眾傳播媒介前，一直是以孫中山的支持者自居，而此次利用批評日本政府的反洪憲帝制政策，公開表示放棄支持孫中山的立場，應可視爲他倆關係發生變化的轉捩點。

如上述，犬養毅藉洪憲問題公開表示不再支持孫中山，對中國內部紛爭，也開始嚴守中立，此種作法在袁世凱逝世後依然持續。例如，民國六年(1917)，中國因參戰問題引發府院之爭，及張勳復辟事件，犬養毅以立憲國民黨總理名義，公開宣稱雖然對捲入劇烈內爭的中國國民深表同情，但鑑於事屬內爭，日本政府應嚴守中

⑭ 犬養毅，「搖籃時代のわが對支方針」，頁718。

⑮ 自民國2年(1913)8月18日孫中山抵達東京，至民國5年(1916)4月26日歸國前夕，孫被日本警方嚴密監視，每日均有監視記錄。根據該記錄，孫與犬養毅在民國2年時會面二次，民國3年時會面五次，民國5年時會面二次。「孫文ノ動靜」，前引書，外務省記錄·革命黨關係，第七一八卷，原件。

⑯ 「犬養毅ト孫文會見ノ件」(1914年8月27日)，同上，秘受6512號，第十三卷，原件。

⑰ 關於日本政府「反袁帝制政策」的形成背景及執行過程，林明德曾做了詳盡的探討。此外，根據彭澤周的研究，民國5年2月至4月間，日本財閥久原房之助在參謀次長田中義一的讚許下，前後五次貸款給孫中山，總金額高達140萬日幣。詳情請參閱林明德，「日本與洪憲帝制」，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四輯(臺北，聯經出版，民國69年)，頁212-251及彭澤周，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8年)，頁180-183。

⑱ 犬養毅，「國策の確立を要す」，日本及日本人，1916年4月1日，頁54。

立。⁷⁹雖然當時參與紛爭的段祺瑞（代表舊北洋官僚勢力）、⁸⁰孫中山（代表革命黨及西南地方勢力）、張勳（代表復辟勢力），⁸¹都曾大力尋求日本支持，但犬養毅以黨的名義要求日本政府嚴守中立的作法，說明犬養毅已無意過問中國政局。⁸²

民國六年七月，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由於段無意恢復國會，孫中山乃以廣州為根據地，組織軍政府，倡導護法以維護國體，自此中國又告分裂，形成南北對立的局面。段祺瑞復出後，日本政府內部援段之說就層出不窮。⁸³犬養為制止日本政府採取親段祺瑞的外交政策，在日本政府的外交顧問組織「臨時外交調查會」上，力陳中國局勢動盪不安，日本實無理由貿然捲入中國內爭，力持反對日本政府內部援段立場。⁸⁴雖然犬養毅反對援段，他也不支持孫中山的北伐政策，他這種嚴守中立、心存觀望的態度，與在辛亥革命時期曾與他並肩為革命黨人效力的老同志、前東京大學教授寺尾亨的言論相較，則更為明顯。寺尾亨不但肯定孫中山護法的必要，並呼籲日本政府應承認軍政府為交戰團體，給軍政府國際法上應享有的保障。⁸⁵相反的犬養毅只是抽象的提倡南北和解，對孫中山的護法政策則隻字不提，針對南北對立的局面，犬養毅仍然堅守觀望的立場，不主張日本參與中國的內爭。

犬養毅的觀望態度，在民國七年(1918)六月孫中山訪日期間更表露無遺。民國七年四月，廣東就醞釀軍政府改組之議，此為非常國會政學會派的議員與西南地方軍閥為了與北方和議，擬就改組軍政府的藉口，達到排斥孫中山的目的而釀成的。孫在此壓力下，於同年五月辭退大元帥職。辭職後，孫中山立即向日本駐上海武官松井石根表達訪問日本的意願，⁸⁶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則要孫中山在日本期間不進行政治活動為條件，才允許他訪日。⁸⁷孫中山於六月十日抵達日本門司。他此行目的，無非是希望透過犬養毅的斡旋，以爭取日本政府對革命黨人的支持，

⁷⁹ 犬養毅，「帝國の前途と吾黨の態度」，青年，1917年7月，頁9。

⁸⁰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三冊，頁197。

⁸¹ 戴季陶，日本論（臺北，故鄉出版社，民國76年），頁117-120。及參閱林明德，「簡論日本寺內內閣之對華政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二十三編民初外交（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頁531。

⁸² 此刻犬養雖在大眾傳播媒介前，已公然拋棄支持革命黨的立場，但私底下並未斷絕與革命黨人的來往。例如張勳復辟前夕，戴季陶曾以孫中山代表的身分到日本，當時就是透過犬養毅的介紹，與政友會總裁原敬見面。「原敬日記」（1917年6月29日），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東京，福村出版，1951年）。

⁸³ 臼井勝美，日本と中國：大正時代（東京，原書房，1972年），頁109-110。

⁸⁴ 「原敬日記」（1917年7月27日）。

⁸⁵ 寺尾亨，「支那南方の軍政府は交戰團體として承認すべきものなりや否や」，國際法外交雜誌，1918年9月15日，頁1-6。

⁸⁶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18年，第二冊，上卷（東京，外務省，1969年），頁15-16。

⁸⁷ 同上，頁18。

因此，他有意到東京訪問，^⑧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⑨他以信件、電報要求與犬養見面，^⑩却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對於日本政府以及犬養毅的冷漠，孫中山憤而提前於六月二十三日整裝回國。^⑪犬養毅之所以置多年友誼於不顧，不願伸出援手，無非是犬養的態度已轉變為嚴守觀望的立場所致。^⑫

嗣後，孫採取聯俄容共政策，犬養毅對孫中山保持距離，更為明朗化。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舉行會談後，正式接納蘇俄的援助。犬養毅對孫此舉，沒有表示具體意見，但從他對蘇俄的中國政策持有敵意的角度來看，^⑬可推測犬養毅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很明顯地不具好感。

民國十二年九月，犬養毅受命為遞信大臣而入閣（山本權兵衛第二次組閣）。孫中山認為，他的入閣是遊說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革命運動不友好政策的大好時機。他懇託與犬養有深厚友誼的山田純三郎，帶其私人密函造訪犬養毅。函中，孫中山一面提及往日宮崎滔天受命與革命黨人連繫，支援中國革命等往事，另一方面則促請犬養毅利用閣員身份，一改日本政府反對中國革命、盲從列強主張的不當政策。孫中山並強調，為圖東亞復興之計，首在日本支持中國革命及率先承認蘇俄政府。換言之，孫中山認為唯有促成中蘇日三國同盟，才能對抗英法等列強的侵略，

^⑧ 民國7年3月2日，犬養毅與頭山滿共同具名函請孫中山赴日訪問。書曰：「貴邦南北對峙以來，世局紛紜不知所底止。……弟茲有欲與閣下面議一事，因望閣下親到東京」。此外，犬養毅與代表孫中山赴日的朱執信會談時也表示，孫肯到日本，他本人將負責安排，與日本各界名流會商，謀求各界支持廣州軍政府。同年4月13日，犬養毅打電報給孫中山，略云為商談「處理督軍方法，兼商量新疆方面，對德人方針」等問題，懇請孫先生親自赴日。由於犬養毅一再邀請，並保證願支援，孫中山依前約，而到日本。同註^③，下冊，頁803, 811。又同註^⑥，頁20-21。

^⑨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8年6月12日。

^⑩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66年），頁138。

^⑪ 孫中山於6月12日發函給犬養毅外，並於18日打電報，邀犬養毅在京都會面。「神奈川縣知事有吉忠一發內務大臣水野鍊太郎宛の報告書」（1918年6月13日），外務省記錄，革命黨關係，第十九卷，神高秘收第3479號，原件。又參閱「神奈川縣知事有吉忠一發內務大臣水野鍊太郎宛の報告書」（1918年6月20日），同上，原件。

^⑫ 同註^⑩，頁139。

^⑬ 犬養毅態度的改變與日本政壇的變化有關。民國6年(1917)俄國的十月革命及民國7年2月德俄修好、俄國退出戰爭等事實演變，促使日本國內政壇掀起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浪潮，代表軍部及官僚系統的寺內正毅總理，主張與中國北方政府簽訂軍事同盟，共謀對抗德俄。但以政友會總裁原敬及犬養毅為首的政黨代表，則主張謀求中國南北政府和解，在日本援助下建立一安定政權，使中國內爭不受共產主義革命影響。犬養毅就是在這段日本政府內部爭執不已的情況下，邀請孫中山訪日。但日本政府最終還是選擇援助段祺瑞，於3月25日與北方政府交換共同防敵公文，進而5月16、19日分別簽訂中日陸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由於日本政府援段政策已定，6月份孫中山赴日時，對犬養毅而言已無任何意義。「原敬日記」（1918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3日）。

^⑭ 針對民國12年11月孫中山來函，遊說他倡導中蘇日三國同盟之事，犬養毅在回憶中透露，由於他不願助長中蘇兩國的接近，故對孫的提議避而不答，「古島一雄宛犬養毅書翰」（1927年，日期不詳），犬養木堂書簡集，頁451。

進而可確保東亞和平，⁹⁵但犬養毅對孫中山的建言並沒有任何表示。孫於民國十三年趁北上之便，順道訪日，準備親自向犬養進言。⁹⁶孫中山期待犬養毅能到神戶相見，但他只委派友人古島一雄為代表赴約，他本人則避不見面。根據負責斡旋此事的山田純三郎回憶，孫與古島一雄會談後，也沒有得到任何具體的答覆。⁹⁷平心而論，此刻孫中山對犬養毅的呼籲，是有強人所難之處，此事可從山本內閣成立的時代背景及犬養毅在日本政壇的實力談起。山本內閣於關東大地震發生的翌日成立，內閣首要課題在於賑災及重整日本經濟，但成立不及四個月，即因皇太子被刺事件引咎總辭。⁹⁸依當時狀況而言，山本內閣似難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而犬養毅本身也只是擁有接近十分之一席位的衆議院少數黨領袖，⁹⁹出任的職位又是居內閣末席的遞信大臣，實無具有影響外交決策的能力。但另一方面，鑑於二次革命之後，犬養毅對孫的多次懇託，一再採取拖延、迴避的態度來看，犬養對孫的呼籲，原本就沒有誠意採取行動，¹⁰⁰對孫已不抱任何期待，也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在訪日回國後不久，於民國十四年三月病逝北平。犬養毅與孫中山長達二十八年的交往，就在孫中山單方向的期盼及犬養毅刻意的迴避下結束。

五、結 論

光緒二十三年，孫中山抵達日本，是孫與犬養毅交往的開始，也是犬養積極援助中國革命運動的起點。孫中山由於得到犬養毅的協助，得以停留日本，並利用日本作為革命黨人活動的基地。雖然孫中山是經由犬養毅援助，得以停留在日本發展革命事業，但彼此對革命事業的看法並不一致。孫中山期待在犬養毅的援助下，能早日實現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理想。而犬養毅支持中國革命的目的，却隨着中國局勢的發展一再改變。在庚子拳亂前，犬養毅援助孫中山的目的是希望運用革命黨勢力來牽制滿清政府的反日政策；庚子拳亂時，犬養毅則在利用革命黨人的起義，製造動亂，以便提倡東南自保運動的各省督撫們可趁勢而起，在中國南方建

⁹⁵ 同註⁸，第八卷，頁401-406。

⁹⁶ 孫中山在日本神戶上岸時，告知山田純三郎，此次趁北上之際，特地繞道日本，就是想和犬養毅商討大計，希望聽取犬養毅高見後再北上。山田純三郎，「回顧錄」，祖國，1954年5月，頁101。

⁹⁷ 同上。古島一雄的回憶錄裏也證實此事，同註¹⁶，頁196-198。

⁹⁸ 白鳥全編，日本の内閣（I）（東京，新評論，1982年），頁146-148。

⁹⁹ 日本衆議院總席次是四六四席，而其中犬養毅所領導的革新俱樂部佔有四十五席。犬養木堂傳，中冊，頁521。

¹⁰⁰ 同註¹⁴。

立親日的政權。庚子拳亂後，犬養毅則期待透過援助中國改革運動，在中國建立一個安定的親日本政權。而這些目標，和孫中山所抱持的理想都有差異。孫中山旅日期間，從生活起居到革命事業推展的大業上，犬養毅都曾傾囊相助，但他對孫中山推展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並不理解。這種理念上無法溝通的事實，於武昌起義後，兩者對中國局勢看法的差異上，明顯的顯露出來。

武昌起義成功後，犬養毅對中國採取的行動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君主立憲的體制下謀求革命黨人與非袁世凱派的漢族官僚合作；第二階段是在立憲君主的體制下企求革命黨人與康有為的立憲派合作；第三階段是在擁岑春煊為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基礎上，號召清朝的政要及立憲派人士加入革命陣營，共同制衡袁世凱；第四階段是支援南京臨時政府，力阻南北議和。前三個階段，他所訴求的重點雖然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打倒袁世凱為主要目的。但此時期他與孫中山之間在想法上有歧見，孫中山是以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為首要考慮，為達到此目的，不惜以政權讓與袁世凱。但犬養毅却以打倒袁世凱為首要目標，不惜犧牲孫中山主張建立民國的理想。而局勢發展到第四階段，却因孫中山逐漸不信任袁，兩者對袁世凱的想法漸趨一致，再加上犬養毅的支援，是孫中山推動革命不可或缺的助力。在此情況下，兩者的交往逐能超越想法的差異，繼續發展。

二次革命時，犬養毅基於反袁世凱的立場，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反袁活動。但二次革命的失敗，讓犬養毅認清革命黨基礎薄弱的同時，也讓他體認到袁世凱掌握大局的實力。因此，他修正既往強烈反袁的作法，並對革命黨的態度，逐漸疏遠，由於他已放棄透過革命黨在中國建立親日政權的想法，所以往後的反洪憲帝制時期及南北分裂時期，他都不再理會孫中山的懇託，反而對中國的內爭採取觀望的立場。及至孫接近蘇俄，他們之間的疏遠，更趨於明朗化。

綜合以上所述，足見犬養毅援助孫中山，並不代表他共鳴於孫中山的理想，也絕非如其本人所言，是基於人道的立場，而是以日本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希望能在中國建立一個親日政權。因此，在二次革命後他發覺革命黨實力脆弱時，即開始放棄支持革命黨，與孫中山的交往也愈趨疏遠。總而言之，孫中山與犬養毅及其所代表的日本民間團體支援中國革命活動，所以集中於二次革命前，是因他們的理念，彼此尚可接納，但經二次革命後，中國的時局以及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使他們之理想無法超越政治現實利益，又由於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一再挫敗，在政治利益的考量下，犬養對孫漸趨疏遠是為現實的政治環境下所使然。